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一五期 ——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12b)

---

【专题研究】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上)	丁凯文
【历史回顾】	我在1966年	阎长贵
【口述历史】	浩然谈江青——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浩 然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专题研究】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上)

• 丁凯文 •

文革爆发到今天已有整整40年的历史。4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文革，努力探究它的原委与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目前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书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文革这一课题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但是有关文革重要人物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周恩来与林彪的研究，国内学者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换句话说，周恩来成为中共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在文革中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作了英勇的斗争，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伟人”；而林彪则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个处心积虑大搞反革命活动的历史罪人。林彪与周恩来是文革开始后位列中共中央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他们都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他们身后却有如此天差地别的评论，实在值得人们深思。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组织文人班子，在1981年6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为对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定位，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到：“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此后国内的学者们基本都遵循了这一论定，国内的党史学者们甚至指出：“《决议》的发表，一方面使人们冲破了认识禁区；另一方面也为进行这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课题的科学研究开辟了航道。”〔1〕从此“‘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的说法也就成为国内学者研究周恩来的共识。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周恩来对

林彪作了哪些“坚持不懈的斗争”？《决议》的发表真的是冲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区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吗？如果我们将周林二人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作一番比较研究，人们应能得出另一种结论。

## 一、周恩来与林彪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助手，而周起的作用更大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

（1）罗瑞卿问题。现在所有中共官方的说辞与回忆等皆众口一词，即罗瑞卿事件是林彪恶意陷害，以倒罗为条件换取对毛发动文革的支持，而1965年12月召开的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所有与会的人士除毛林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开会的目的何在。似乎毛泽东在着手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前，手下的大员们全被蒙在鼓里。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言，这么多与会者又如何及时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又如何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项战略部署呢？毛泽东是这么一个要打无把握胜仗的人吗？而周恩来在倒罗的过程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早参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一些玄机。王力说“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了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自由了。”（2）这里有几个问题很清楚，即倒罗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安排好各地大员们“先稳住罗”，不仅如此，甚至还要“防止罗逃跑”，等上海方面一切部署妥当再通知罗赴上海与会，以顺利完成倒罗的部署。显然，罗瑞卿自己感到有些异样，否则就不会“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如果李井泉、阎红彦等地方大员们对倒罗一事毫不知情，他们又如何贯彻“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以稳住罗呢？事实上，据知情人士透露，毛泽东早就通过一些老师向他们的部下打了招呼，所有与会的老师 and 将军们除贺龙一人不知会议的真实意图外，其余皆知此会的目的何在。罗到昆明时，周恩来特地在电话中明确指示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所以，毛泽东策划倒罗是为其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扫清前沿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倒罗问题上，周恩来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行动上积极配合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吹了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3）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并告知“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看林彪”（4）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5）

（2）5月政治局会议与防止反革命政变部署。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在谈及文革时，都将林彪的“518讲话”视为林彪个人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危言耸听要打倒一大批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的讲话开宗明义地讲“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显然，林彪的讲话是毛泽东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一致同意下所讲，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项重要部署。接着周恩来在5月21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周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周还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6〕在具体的部署方面，周恩来在5月15日与叶剑英联名致函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7〕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担任。26日周恩来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在会上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31日周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及增调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8〕周恩来在1967年1月27日接见公交口革命造反派时坦承：“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任务：1、保卫中南海安全。2、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3、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4、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5、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9〕

显而易见，在防止所谓的反革命政变一事上，周恩来不仅讲了话，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10〕这一分析应是十分中肯的。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勃发。文革初起时，毛泽东为了发动广大学生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大力支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使得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迅速展开。国内的一些党史论者大都将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归结为别有用心，如将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讲话作为其煽动文革的一项罪责，称“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11〕且不说林彪这篇奉命而读的讲话出自陶铸的写作班子，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12〕毛泽东更在这个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赞赏性地对林彪讲“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13〕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在8月8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讲话、8月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和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均表示赞成。〔14〕周恩来自己在9月25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15〕那么周恩来又是如何积极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呢？目前官方的《周恩来传》等都承认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在解释上大都将周的言行归结为“很不理解”、“违心”和“被动”，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16〕

红卫兵搞大串联，要到北京见伟大领袖，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要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交通以及安全等问题，但这却是毛泽东的设想。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

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17〕。

周在8月5日清华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18〕8月27日周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19〕

在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大力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20〕

周恩来还精心安排了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从组织、安排、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周对此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21〕

由此可见，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疯狂设想很难如此顺利实现。即使周在事前“不太理解”，但在行动上周则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4）关于造反派造反夺权问题。夺回被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夺的党政大权是文革开始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特别提及要揪出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的一项重要罪名就是“为了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煽动造反派强加给他们‘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周恩来“对于林彪、江青这种倒行逆施，周总理表示坚决反对。”〔22〕那么，周恩来对待造反运动是“坚决反对”的吗？针对1967年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各大区及省委书记们存在的担心和疑惑，周恩来在1月14日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赶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23〕对于是否夺权和如何夺权的问题，周恩来在1月17日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说“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干部、职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夺权？要夺权！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得清楚，要夺权。需要夺权的，决不能迟疑。”“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统，北京公安局就夺了权嘛！中央文革要帮助他们，条件成熟的先夺权，条件不成熟的先监督，夺权！第一是领导权，就要管它，监督它，（江青插话说：业务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这

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要靠你们的革命实践，经过你们实践，我们再总结，提高一点。”〔24〕周随后在1月21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25〕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连王力都认为“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由此而来，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此后，各省市、各地区造反夺权不断，导致更大规模的动乱局面。这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设想和部署，是江青和“上海帮”冲锋陷阵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的作用密不可分。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的步步紧跟，丝毫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坚决抵制”这一夺权运动的，更看不出周恩来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不同之处。

## 二．周恩来与林彪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于“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26〕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考察周林二人对此小组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怪胎，它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但却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且具有极大的权力，负责指导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名义上是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副组长，但陈伯达很快就被边缘化，江青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等人对江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迎。〔27〕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28〕

由于文革疯狂的夺权运动，中共的党政系统，特别是国务院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不少干部被关押、批斗，政府日常活动陷于瘫痪，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如日中天，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权力核心。面对江青等“上海帮”咄咄逼人的攻势，周恩来基本上采取了隐忍的顺守之道，从不敢公开反驳，更不要说“坚决抵制”了。由于“二月逆流”后毛泽东采取高压手段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帅，周恩来也被迫跟着检讨。江青趾高气扬，开始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周恩来叫板夺权。1967年2月江青就曾指着周的鼻子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29〕江青甚至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总觉得周恩来做得不够，逼周恩来交权，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只好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30〕周恩来作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此时竟然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吴法宪将军时任空军司令，曾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吴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31〕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文革不过就是毛氏夫妇的双簧表演，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必须对毛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周恩来此时已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周内心虽然极为苦闷，但却始终保持冷静，从不声辩，更不会拍案而起，周恩来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步了刘少奇、陶铸等人的后尘，随时可能被毛江抛出予以打倒。此时的周恩来步步紧跟尤恐不及，何曾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私下的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提醒周

恩来要提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1945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周还叮嘱李志绥不要同任何人讲此事。连李医生都看出“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32〕周恩来此时只敢私下叹气，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见容于江青这些文革暴发户。王力则评论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33〕

1968年3月24日是毛泽东解决“杨余傅”的重要日子，当晚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约而同地高调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周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还振臂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34〕

林彪在会上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35〕

当时也在场的林办秘书张云生注意到林彪说到江青时故意压低了调子，看得出林彪当时讲得很勉强。张云生隐约地感到林彪这时的讲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显得言不由衷、逢场作戏，很可能是政治形势所迫。周林等人讲完话后，《东方红》的乐曲突然响奏起来，毛泽东随即从主席台右边走了出来，全场立时欢声雷动。〔36〕这充分显示出这次解决“杨余傅”的会议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又一个“伟大战略决策”。

周恩来和林彪在公众场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给当时隐身幕后的毛泽东看的，是在向毛泽东表忠心，江青不过就是在前台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决策人。整体来看，文革初期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怀戒惧，诚惶诚恐，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是毛泽东、江青推动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体执行人。

林彪虽然贵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从介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除了在毛泽东需要时出面

讲话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林彪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不大买账。据吴法宪回忆，江青等人在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指责总政主任萧华没有在军内搞起文革运动，声称“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要求萧华当晚去工人体育馆参加群众大会。（37）江青等人就是想通过打倒总政主任萧华，再弄倒军委前台的叶剑英，达到插手军权的目的。这一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很清楚。叶剑英在20日上午赶到林彪处，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边的茶几，高声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38）吴法宪说“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21日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中央文革却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军队一些干部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江青听了关锋的汇报后认为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会议，要求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检讨，而徐却推给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让黄作检讨。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由于不满徐向前的态度，几次要求林彪再换他人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被林彪拒绝。林彪事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说：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销声匿迹了。（39）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1967年2月军委颁布的八条命令实际上亦是针对造反派对军队的夺权运动，起到了抑制造反派的作用。

对于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事务，林彪则坚决予以抵制。林在1968年曾对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位将军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乱的。”（40）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领导下坚决站在周恩来与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帮”的无理取闹，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加强战备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 三．周恩来、林彪与“三支两军”的关系

自从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各省市地区、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以及单位部门等无不分成两派，造反夺权无日无之，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个个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派性的膨胀使矛盾

不断激化，以致全国出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如何控制这一局面，毛泽东的策略是祭出解放军这一法宝，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军队从此深深地介入地方的事务。所谓“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而“支左和军管”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与林彪也都卷进这一事件之中。

既然“三支两军”的主角是军队，按理说林彪作为当时军队的主管人物应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我们却发现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即林彪对这些具体的军务甚少过问，而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周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具体管得很深很细，尤其是“三支两军”的过程中，更体现了周氏对军队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毛泽东就1967年1月21日就南京军区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41）1月27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时说“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42）这实际上是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开端，而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43）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44）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45）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46）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47）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48）5月19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



人，要拿你们是问。（49）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50）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与“三支两军”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虽然到会讲话，但基本上是打些官腔，实质内容不多，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51）林彪讲话后，毛泽东与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显示出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王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林彪有极为独到的见解，王力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52）

#### 四．周恩来、林彪与“打倒老干部”问题

现在大陆官方给林彪定罪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就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风”，而周恩来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3）另外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述评》中也提到国内的研究者都用“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来形容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他们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对陈毅、贺龙、彭德怀和宋庆龄等人的保护，以及文革后期对邓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将军等事。（54）这样一正一反衬托出周恩来对老干部是真心保护的，而林彪对老干部则是残酷迫害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然而，这场“革命”首先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然后却要广大老百姓自下而上造反夺权。既然文革是一场“革命”，是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是一场全民的“夺权”运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广大上层领导阶层形成巨大的冲击，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委的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打倒或被夺权的范畴之内，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有时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他们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忆里说“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罗瑞卿除外，他由军委处理。另外加一个田家英。当时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据毛主席指示，由刘少奇主持，成立一个组，分别同四个人谈话，处理他们的问题。这个组少奇同志决定由周总理总负

责。下面分四个分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第四组安子文是组长，成员由王力、戚本禹，在周总理统一部署下工作”。（55）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在后来有所增减，但大的格局基本未变。据知情人士透露，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负责的内容包括被审者的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家属探视等，周恩来可说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后来的很多老干部回忆文革文章中都看到这样的叙述（虽说大多数都是正面回忆）。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56）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1966年10月3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57）11月28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1967年10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叛变了，也是叛徒。”（58）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59）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随着文革按着毛泽东的思路不断深入开展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被抛了出来，周恩来也一改过去不许红卫兵批判刘邓的做法。1967年1月7日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说“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把方向指向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更进一步指向反党集团。现在正在进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反党集团，以及环绕这个集团的许多人，比如计划经济战线上的反党集团是薄一波，而不应该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象安子文这些人是负有跟彭真一样的反党罪责的，你们这个时期在北京的许多批判大会上，已经点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斗争的矛头一定要指对。我们应当把批判反党集团的罪行，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斗、批、改这个斗争结合起来。”（60）

1967年到1968年之间全国各省市地区的领导人有不少被点名批判打倒，周恩来也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象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1〕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处理因夺权斗争而引发的各省和地区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是“三支两军”后部队系统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则重新进入新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疯狂夺权而迫害老干部时，一些老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原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因为被毛泽东江青点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现在不少书籍谈及此事时都说周对此很悲愤，并说“这个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62〕由此显示出周对老干部的惨死悲愤异常。然而，周还有他的另一面。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其他场合还不止一次说到阎红彦之死，在1月14日的对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63〕周恩来这种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态度岂是用“大树参天护英华”一词就能加以掩盖呢？

文革中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也相应倒台，大者如贺龙、杨勇、廖汉生等人。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与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革命组织时说“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结论。”〔64〕实际上廖汉生1月8日即被抓，杨勇在一个多星期后也被关押，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1967年8月1日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时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地，（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8月2日周又说“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65〕不久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报送审查报告，毛则在9月13日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随即被关押在国务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沟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审查报告上亲笔写下了大段的批语，实为对贺的落井下石。高文谦先生说“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66〕

那么林彪是如何对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呢？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从内部的文电

中得知阎红彦自杀的消息。林彪听后，身体颤抖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此前不久，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也由于经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致死。林彪听到那个消息后，身体也颤抖了一下。……这一期间，林彪的情绪相当坏。文件不爱听，‘转车’也少了，平时整天闷坐在沙发上……”（67）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68）林彪还托王秉璋将军向张霖之的遗属表示慰问，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并与周恩来一起促成了张霖之的女儿与邱会作的儿子的婚事。林彪对李蕴华说“他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赵尔陆将军过世后，林彪也接赵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湾休息。王秉璋将军因被残酷批斗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对此极为愤怒，大骂“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说“你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不要出来，避避风潮。”（69）赵尔陆和王秉璋都曾经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张霖之却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元凶，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以上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林彪内心对打倒老干部的反感和其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周恩来在打倒刘少奇一事上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文谦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述，（70）此处不再赘述。笔者这里想谈的另一件事是林彪与刘少奇一案的关系。文革期间林彪从未管过中央专案，也未直接负责过其中任何一个案子。但后来的“两案”审理过程中，特别给林彪加上了一条蓄意迫害刘少奇的罪名，中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特别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71）这也是当局指控林彪参与迫害刘少奇的唯一证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1966年8月就积极投靠林彪集团蓄意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可是在两案审理时，特别法庭对以上指控并未进行过专门的庭审调查，雷英夫在审判后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罪行予以追究锒铛入狱，反而在后来还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先生曾专文辨析雷英夫的问题，予以详尽的分析，余先生对此特别提出疑问：“惟‘诬陷材料’为什么会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现有材料来看，雷与刘勉强可以扯得上有些关系的，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军调部，刘后来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时参加军调部中共方面工作，与雷短期共事过，而中共建国后雷与刘、王便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难道真的是叶群告诉他的那一句话起了刺激作用？况且，雷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高层的变动，以及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揣测得如此迅速、准确，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真是匪夷所思！”（72）此外，以林彪的地位，怎么会找上总参二级部的一个副部长来诬陷刘少奇呢？笔者见过国内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与雷英夫多次详谈。据雷英夫本人讲，那个所谓林彪指使雷诬陷刘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两案”审理小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认，惟如此才能给林彪安上蓄意诬陷刘少奇的罪名。正由于这是出自“两案”审理小组的授意，雷英夫日后不仅不会被追究“诬陷罪”，反而属于“为党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级别享受离休待遇，雷损失的无非就是个人的名声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提出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所谓的林彪蓄意诬陷刘少奇不过就是中共当局的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林彪虽然在刘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几句表态声明的话，但与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上的实际表现和作用相比较，林彪差周恩来何止十万八千里。

整体来看，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

有一些毛并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通融照顾。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73〕其实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现在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未完待续）

~~~~~

## 【历史回顾】

我在1966年

• 阎长贵 •

在1967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前，我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或称办事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被选作江青的秘书，除了家庭出身好和社会关系简单外，大概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是一个原因。本文拟谈谈1966年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

1966年4月，红旗杂志社机构调整时，我从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调出，分配到戚本禹任组长的历史组。5月，戚本禹回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6月3日，戚本禹把我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参与接待来访群众；7月4日，又把我转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组；8月，又让我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围绕在戚本禹身边转，我的工作由戚本禹安排。

◇ 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说过一些非常狂妄无知的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诚心诚意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和决心，是自己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这决不是什么自我表白，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和这样认识的。根据当时红卫兵的记录和编印的材料，引述几段我当时说过的话。

1966年11月2日，我在红旗杂志社接待室同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代表谈话时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就是造修正主义反，揪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搞这场革命，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会在中国出现，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到那时我们就会掉脑袋，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就是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我们必须懂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

1966年12月的一天（当时红卫兵的记录中没具体日期，我也记不清了），我在接待武汉一些教师和学生谈话时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一个意思。这些人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政变，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想上台。虽然他们在台上，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就要夺权嘛！夺无产阶级的权，改变无产阶级的性质？我们要保卫毛主席，不是一般号召，要全副力量去奋斗。我们的父兄，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我们要拿全部力量保卫江山，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这是我当时一再宣传的思想和观点，看上去很冠冕堂皇。说实在话，这并不是我的什么发明创造，只不过是通過我的口说出来的当时毛泽东的思想——而我对它的相信和接受是真心的、虔诚的。

当时，我很狂妄，也说过一些非常无知的话。比如对古人的看法。1966年12月7日，我在红旗杂志社教育楼接待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时谈话，其中说道：“旧社会有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在马列主义者看来，旧社会的宰相都是小人，他们都是地主的走狗。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宰相，我们要有更宽大的胸怀？我们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比他们高大得多，我们要敢于蔑视他们。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斯大林说：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是大海之一粟。”接着我还说：“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作为批判材料引用我这句话，顿时一阵脸红。记不得在什么场合说过这句话了，苦苦寻觅，终于在1966年12月7日的谈话中找到了。我感谢当年红卫兵编辑印刷的材料——说实在话，他们当年编辑的材料，很有史料价值，是恢复“文化大革命”本来面目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关于古人说的这段话，一方面表现了我当时的无知和狂妄；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相当流行的一种全盘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我不惜篇幅和浪费读者的时间，抄录当年红卫兵编辑的材料中记载的我所说过的几段话，意在袒露当时思想的原始形态（在这一点上，我十分感谢当年的红卫兵），以利于说明我当年的行动。

#### ◇ 参与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界打着“百家争鸣”旗号的学术批判不断。我也积极参加了其中的一系列活动，如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都写过文章。一般说来，对不同意的观点，即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当时上纲还只是上到“违反”、“不符合”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观点，还没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从1964年开始的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其政治味道就很浓了。在这场运动中，我参加的工作很少，大概只写过一篇两三千字的没发生什么影响的短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学术批判——大批判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对姚文元的文章，我没发现什么问题，是积极响应的。我参加过整理供批判用的“三家村”的材料，也参加过写批判文章。而在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活动和最大的错误，是积极参与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过去，我对翦伯赞的著作和文章没怎么读过，了解不多。1966年3月，在当时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的组织下，由红旗杂志社和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七八个人讨论并撰写批判翦伯赞历史观点的文章。戚本禹当时还把红旗杂志社印刷厂和食堂的一部分人动员起来，边写边排，“奋战”一昼夜，将写出的稿子经过筛选，选定林杰写的两节（“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和我写的一节（“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再添头加尾（这主要由戚本禹执笔）组成批翦伯赞的文章。这就是那篇署名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3月24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上。这篇“急就篇”，仿佛也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但戚本禹觉得这篇文章上纲不够，还称翦伯赞为“同志”，怕被别人说成不“突出政治”，搞“纯学术”批判，就指示我再写一篇上纲更高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这就是那篇主要由我起草，经关锋和戚本禹改定，发表时仍然署名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的文章，发表于1966年12月13日出版的《红旗》第15期。在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事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深感错误严重，十分懊悔和负疚；而当时是“理直气壮”，坦然为之的，大概问题的可怕也在这里！

#### ◇ “运动”工农兵群众搞大批判

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对群众路线的错误理解和滥用。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它是被当作法宝使用的，仿佛学术批判没有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就没有声势，就没有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66年3月底，关锋等组织人到各地召开工农兵座谈会。他派我会同《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丁健生、编辑刘相诚去辽宁、吉林，他自己带着几个人去山西太原，还有人去天津、济南、上海等地。我们一行到东北，在沈阳、鞍山、长春，召开了三个工农兵座谈会，参加者有全国著名的模范售货员，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素文等人。几路人马回来后，将座谈会记录加以整理（实际上很多是根据需要编写的，这也是一种弄虚作假），发表在1966年4月29日出版的《红旗》第6期上，题目是：《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此外，我还在《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指导下，主笔起草了《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的评论员文章，其中宣称：“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创举。在旧社会里，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术论坛全是被一小撮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的，他们搞学术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农兵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加学术工作的可能。人们一提起学术，一提起理论，总认为这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了，工农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做了主人，也要做文化的主人，剥削阶级垄断文化学术的丧钟敲响了，工农兵直接掌握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工农兵群众直接登上学术论坛的时代也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不可否认，工农兵群众中确有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很生动的语言，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认真倾听和学习，但这篇评论员文章所说的完全是一套大话、空话，毫无实际意义。对这件事，在当时我很自鸣得意，喜洋洋的，觉得做了一件好事。

◇ 奉戚本禹之命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领导人朱成昭，让他们到成都揪彭德怀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戚本禹叫到我他办公室，气冲冲地（仿佛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很可能是刚刚从江青那里回来，我没问）跟我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我当时也没多想什么，他让我去就去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我本人的觉悟和认识，我也不会提出什么——我所想的，倒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我一定好好去完成。可能就是在戚本禹跟我谈话的当天下午，我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找朱成昭，见面后，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可以派我们的王大宾带几个人，他很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就这样谈定后，我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他没说什么。几天后，戚本禹收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份材料，其大意是：他们到成都和彭德怀谈了五六个小时，彭比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不反对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因而对要不要揪彭发生了疑问。就这件事，戚本禹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戚本禹一方面批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上当了，受骗了，同时又直接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头头韩爱晶打电话，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而这也就是后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两个学校红卫兵互相争揪彭德怀以及联合批斗彭德怀种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所在。在到成都揪彭德怀的问题上，我奉戚本禹之命去通知朱成昭，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受厄运的一个重要的具体环节，也是我的一个严重错误。

这个问题，即到四川揪彭德怀问题，对我来说迄今还有不少谜，我认为很多写彭德怀的书，也没完全说清楚。尽管戚本禹当时很狂，我看他也没有胆量擅自决定这件事。当然，他内心是赞成和主张把彭德怀揪回来的。据有的关于“文革”的书上说，早在1966年4月12日，戚本禹、关锋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有保留”和“反对”。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事

情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对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戚的辩护律师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这样说，我觉得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江青为什么敢于提出“把彭德怀弄回来”？说到底，恐怕还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变化。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到1965年他又亲自点将，让彭德怀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说：“老彭，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经过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欣然领命：“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尽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毛泽东这话对彭德怀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 ◇ 积极支持张贴陶铸的大字报

最早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浙江某中学的一个高中生，他除了受当时一般的极左思潮影响外，还可能受当时批“三家村”的直接影响，专批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写有两万多字，用了60张大字报纸，贴在前门大街很显眼的地方。对这张大字报我听说过，不记得看过没有。还有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是与我有关关系的。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玩弄折中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诉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确实很长，有1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作了摘要，压缩到四五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高兴，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话说得斩钉截铁。我心想戚本禹肯定是从江青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或作了什么研究；而我当时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他们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是12月2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位同学他们因为贴陶铸的大字报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也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这就是在北京某高校红卫兵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上保存下来的《戚本禹同志12月20日给教育部××等五位同志的信（电话记录）》。略去抬头，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他事情，一直没有答复你们，请你们原谅。

我对你们那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李××、钱××、齐××、朱×、刘××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出笼，上下配合很紧密，大字报贴前受到戚本禹（也包括我）怂恿，而大字报19日贴出，20日戚本禹就写信支持。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心态十分自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戚本禹的信貌似温和，实际上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死地。所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这封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仿佛没请示江青，也没有和谁商量。这封信在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后，可能当日就抄出，贴在沙滩北街2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他们写的那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以及戚本禹那封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很难说这二者有什么联系，但这张大字报，特别是戚本禹的信，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一种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揪陶铸联络站”也成立起来了。

积极支持张贴陶铸的大字报，这是我在“文革”中的一大错误，这个问题曾以《一张反对陶铸大字报的出笼经过》在《党史博览》2003年第1期单独发表过，这里只列出问题，不再重复叙述。

以上这些是我在1966年所做的反映我对“文化大革命”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的几件事情，从中可以看到，除了“运动”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一件事外，都是和戚本禹相联系的，都是在戚本禹的组织和指示下做的。我这样说决不是向戚本禹推卸责任，而是如实反映情况。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既不会再为戚本禹带来什么，也不会再为我带来什么。再重复地说一次，这些我在当时都诚心诚意地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是思想政治觉悟高的表现，而不认为是什么错误和问题。

如果说这一年即1966年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说的话，那就是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普通工作人员，有时说话比部级大干部还管用。比如，1966年冬或1967年初的一天，北京某所高校的红卫兵到北长街抄陈云的家，要抢档案，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没解决，红卫兵硬是不撤。问题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派我去。我去后，童小鹏还在场，仿佛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杨德忠也在场，他们看我来了，简单说了几句，就走了。我问明情况，看到红卫兵把陈云家的一个门都弄倒了，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认为陈云反对毛泽东思想，你们可以批判，也可以向中央、向中央文革反映。陈云家的档案，都是党和国家的机密和绝密，你们怎么可以抢呢？你们抢了干什么？我还跟他们说，总理派人

来，你们不听，陈伯达、江青同志派人来，你们也不听，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像你们这样革法，造反能像你们这样造法？……我这些话许多领导干部当时往往不敢说，而我不怕，一是我不是当权派，二是我年轻你抓不着我什么。再说，你造反，我也造反，并且就在支持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和他们“情感”相近，所以有时我敢批评他们，甚至说得很厉害。在我的劝说和批评下，他们说不出什么，于是慢慢撤了。大干部的权威不如小干部，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怪现象，而在当时却相当普遍。“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怀疑，都搞得灰溜溜的，这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

□ 《党史博览》 2007年第11期

~~~~~

# 【口述历史】

浩然谈江青——节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 浩 然 •

“四人帮”倒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害怕又委屈。……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现在有人故意丑化江青，我认为不应该。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惟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 选自《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